

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研究专题

马克思历史结构中主体思想对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孙建华

〔摘要〕 马克思历史结构中主体思想以资本逻辑批判为底板,将主体置于历史结构之中,它认为主体性、主体间性和公共性是在生产方式的历史运动中生成与建构的。它揭示了历史变迁的内在机理,启示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走进时代深处,紧扣生产方式矛盾运动把握百年变局的堂奥。这一思想为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的展开方式确立了思想路标。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要将观念批判与实践推进相结合,展开其新时代的运行逻辑,让主体间交往与投身社会实践相统一,在“两个大局”中确立其历史任务。

〔关键词〕 马克思;历史结构;主体思想;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

在百年变局背景下,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防止疏离世界历史进程而与社会现实失之交臂,需要将马克思历史结构中主体思想放置于理论空间的核心位置。马克思历史结构中主体思想以资本逻辑批判为底板,将主体置于历史结构之中,认为主体性、主体间性和公共性是在生产方式的历史运动中生成与建构的。只有拥有这一历史眼光,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才能直抵历史深处,切中时代问题的中心,领悟世界之变局。

一、马克思历史结构中主体思想要义

有学者指出:“在四十多年的各种教育改革中,‘主体教育’是能够表征时代精神的一个重要教育词汇。”^①还有学者指出:“‘主体教育论’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理论与实验研究取得的重大成果之一。”^②然而,尽管有四十多年的研究,形成颇具规模的研究共同体,但对究竟什么是主体,尚缺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追问。在马克思看来,主体具有历史规定性,它是一种社会实践的存在,没有超越历史结构的主体。马克思立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展主体批判,通过商品、货币、资本、雇佣劳动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主客体关系和主体间性,使主体摆脱了西方近现代传统哲学的抽象解释。体现历史结构的生

孙建华,法学博士,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苏州大学基地研究员(苏州 215123)。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及其关系研究”(21&ZD009)阶段性成果。

①周林:《主体教育实验的科学哲学分析》,《教育研究》2023年第8期。

②靖国平:《学生成为智慧活动主体的存在方式与成长样态》,《教育研究与实验》2023年第6期。

产方式成为主体思想的核心范畴,马克思根据生产方式的历史发展阶段的思考来“消除实体、主体、自我意识和纯批判等无稽之谈”。^① 上述思想在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中鲜有论及。

1. 主体在社会关系中成为“现实”的人

马克思指出:“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②在这样的整体之中,人与物作为部分是被整体所规定的一个要素。马克思说:“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就像黄金本身并不是货币,沙糖并不是沙糖的价格一样。”^③脱离了社会关系,黑人与纺纱机都变成了抽象的、无规定之物。人与资本、主体与客体、主体间性只有在社会关系中才能把握。一定历史阶段上的生产方式是判定上述关系性质的依据。马克思历史结构中主体思想不是西方近现代主体哲学的单向度发展,而是超越后者,它以生产方式而不是以主体为中心说明人的发展。

马克思指出:“[蒲鲁东的说法]就象下面这样的说法一样: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并不存在奴隶和公民;两者都是人。其实正相反,在社会之外他们才是人。”^④“A 作为人并不是奴隶。他在社会里并通过社会才成为奴隶”。^⑤ 当今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如果不从马克思历史结构中主体思想看问题,抽象地谈论人的主体性和人的发展,对人的看法就近似于蒲鲁东的说法。马克思说:“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有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⑥马克思历史结构中主体是现实的个人,它包含着社会关系维度。区别于西方近现代主体哲学,马克思认为对主体问题的理解不能囿于个体经验表层的分析,而应该穿透各种经验表层,走向历史结构的深处。马克思在分析主体实践活动时引入生产方式,他发现了历史结构中主体的内在矛盾。

马克思揭示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个体主体在与社会关系“遭遇”时产生了生存悖论。从个体层级、事实层面上看,人的行为都是自主性的,人是自由主体。马克思说:“商品不能自己到市场去,不能自己去交换。因此,我们必须找寻它的监护人,商品所有者。商品是物,所以不能反抗人。”^⑦ 从社会层级、现实层面上看,个体主体“遭遇”社会关系,自由个体的感性存在(如工人自由出卖劳动力)就变成了不自由的。马克思指出:“要使个人作为……流通过程的独立的主体发挥作用,已经要以另外的更为复杂的并且同个人的自由和独立或多或少发生冲突的生产关系即他们的经济关系作为前提。”^⑧这一历史结构性的经济关系不以个体主体的意志为转移。

这里似乎有着个体主体与社会关系的双重在场,其实不然。个体主体行为与历史结构中的社会关系不是彼此分离的,个体主体行为与社会关系运行是同一行为过程。马克思说:“私人劳动成为它的对立面的形式,成为直接社会形式的劳动”。^⑨“个人的行为转化为社会关系,转化为某些力量,决定着和管制着个人。”^⑩其思想的深刻之处在于:同一种行为,从个人行为的角度看,人是自由的主体;从社会关系的角度看,个体的主体性活动受社会的经济关系制约与支配,恰恰是不自由的,资本控制着主体间交往。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68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44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486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20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220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1—72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02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53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58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273页。

在这个世界中,一切自由与平等荡然无存,只有物对人的统治,资本主体性代替了人的主体性,产生资本共同体这一虚假共同体。资本主体性的逻辑就是资本增殖逻辑,它将一切事物(包括民族、国家)都视为榨取剩余价值的客体,“没有什么东西表现为自在的更高的东西,表现为自为的合理的东西。”^①它具有零和博弈的特征,造成国家间的“核心—边缘”区位,引发“百年变局”,使现代文明处于危机之中。

社会层级的问题不能简单地还原为个体层级问题。所谓熟知并不等于真知。当人们从日常生活的习以为常的经验性事实层面理解人的行为时,未必真正理解了人。例如,单独从资本家的个体行为理解资本家,尚不能理解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停留于经验事实层面的现象界,就会陷入费尔巴哈般的对人的抽象理解。只有从实践上考察人,才能超越其社会存在的经验直接性,上升到本质界。只有从社会关系上才能把握资本“人格化”的实质——追求剩余价值。主体是历史存在物,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关系影响着主体的类型和特质。

2. 拜物教意识停留于个体主体层面观察问题

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是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总体考察,它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将主体哲学问题与历史结构联系起来。马克思揭示了主体性与主体间性如何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现身,体现出主体特有的历史性。在资本主义社会,物的关系支配人的关系,这是拜物教意识产生的基础。

拜物教存在着两种形式:一是社会现实层面的物化。马克思将物化界定为资本主义的显著特征,他指出社会现实层面的物化本身就具有拜物教性质。马克思说:“商品世界具有拜物教性质”。^②“收入的形式和收入的源泉以最富有拜物教性质的形式表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③物化使人与人的主体间性关系通过物(商品、货币与资本)的关系体现,后者掩盖了前者。主体间性关系受物的关系所统治,主体的人沦为客体,商品、货币和资本成为社会关系的主体。二是意识层面的物化。马克思说:“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④资本实质上是社会关系(包含主体间性关系)。资本主体性有赖于主体间性,主体(人)与客体(商品、货币与资本)关系就包含着人与人的主体间性。“所谓拜物教不过就是商品社会中各个主体把他们之间通过商品交换所形成的主体间性关系或社会关系,看作独立自存的实体而已。”^⑤拜物教徒一叶障目,看不到主体与客体、人与资本的关系内含着主体间的社会关系本质,并在观念层面上对物化社会结构产生了顺从意识和认同意识,即物化意识。进而,把货币权力神圣化,将商品交换原则视为普遍的、超历史的绝对的原则,滋生拜物教。“拜物教徒”的意识停留于个体层级、事实层面,它不能上升到社会关系层面去洞察物背后的人的关系。

西方近现代主体哲学停留在个体行为的表面,认为人都是自由与平等的。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理论家眼中,商品世界成为“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⑥资本主义理论家们出于自身利益需要构建出所有人都是平等、自由的主体理论幻象,使社会关系显得自然合理,掩盖了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⑦马克思从生产方式的视域检视“主奴关系”,指出“整个的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对生产的关系中”。^⑧马克思说:“尽管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90页。

②《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99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02页。

④《重读〈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426页。

⑤王南湜:《〈资本论〉物象化论解读的贡献与缺憾》,《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76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5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7页。

个人A需要个人B的商品,但他并不是用暴力去占有这个商品,反过来也一样,相反地他们承认对方是所有者,是把自己的意志渗透到商品中去的人。因此,在这里第一次出现了人的法律因素以及其中包含的自由因素。谁都不用暴力占有他人的财产。每个人都是自愿地出让财产。”^①在物化的社会中,从表面上看,人都是自由与平等的。这是近现代主体哲学产生的自由主体错觉的社会诱因。马克思揭示了西方近现代主体哲学的“意识形态”之谜,这种理论源于物化意识。马克思提供了对西方主体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路径:这一理论既有逻辑建构过程(西方近现代主体哲学家们通过理论的前后传承、借鉴进行自由理论建构),又有社会建构过程(西方近现代主体哲学形成的社会历史原因)。在实现重要视域转换(以生产方式而不是以主体为中心说明人的发展)的基础上,历史唯物主义的主体问题凸显出来,马克思提出了扬弃物化的新主体:人民群众。这使主体性活动不再是抽象的个体主体活动,而成为扬弃物化的规范性的群体主体活动。使主体理论的“主体是谁”这个元问题发生了变化,由主体是个体重新定位于主体是人民群众。

3. 主体性活动是扬弃物化的规范性的群体实践活动

马克思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②马克思将主体问题置于社会实践中加以考察。这里,凸显了主体能动维度。

马克思对旧唯物主义的批判适用于对拜物教徒的批判。马克思指出:“如果交换价值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这种说法正确的话,那么必须补充说:它是隐藏在物的外壳之下的关系。”^③交换价值作为“物”既具有实体的形式(物的外壳,如金属币、纸币、电子符号等),是可感觉的;又蕴含着社会关系,凝聚着人类无差别的抽象劳动,是超感觉的。拜物教徒停留于感性的物的外壳层面,它与旧唯物主义一样,对事物(蕴含着交换价值的商品、货币、资本)只是“从客体的或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将其视为感性直观的物。“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看不到这种物的外壳之下有着主体性劳动的客体化,“见物不见人”。要理解事物,必须祛除“物”的遮蔽。虽然“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但唯心主义依然具有旧唯物主义被“物”遮蔽的特征。主体问题在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范围内无法得到科学解决。

主体能动只是一个维度,“马克思所讲的实践就不只是反映主体能动过程的一个概念,而是凸显社会实践的革命性功能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这种实践活动是有原则的,它必须完成批判性、革命性的任务,即必须朝着自由人联合体的方向发展。”^④这一社会实践具有规范性,它有发展方向。当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时,就反映出主体活动的社会实践规范性维度。西方近现代主体哲学由于没有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视域,无法区分主体能动维度和社会实践规范性维度,它仅仅看到的是前者,无法察觉社会实践规范性维度及社会实践的内在矛盾——贫富差距拉大及历史趋势。

社会实践规范性维度揭示了由生产方式矛盾运动引发的社会实践具有超越性,它最终否定资本主体性,“把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⑤朝着“自由人联合体”的公共性方向发展。马克思资本主体性批判蕴含着和谐主体间性和公共性向度。马克思通过生产方式解读历史主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95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4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95—196页。

④唐正东:《有原则的实践:马克思实践概念的应有之义及当代意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4年第3期。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7页。

体,透过个体能动性的表层,深入到社会实践规范性的深层,揭示了社会实践的革命性功能。对于主体来说,只有辨识了资本主体性,达到个体能动性与社会实践规范性的辩证统一,才会产生真正能动性。脱离了社会实践规范维度,个体能动性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其能动性就是表面上的虚假的能动性。工人阶级只有自觉地意识到自身的公共性历史使命,才能达到真正能动性。以往的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仅仅凸显了主体能动维度,遗忘了社会实践规范性维度,其立论基础与西方近现代主体哲学抽象的人性论相同。

历史结构中的主体由个体主体和群体主体构成,主体主要指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劳动主体,它是具有批判性意蕴的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是对抗资本主体的公共性力量。“资本的本性是私人性的,但其私人性的实现离不开公共性,私人性和公共性的矛盾构成了资本的内在矛盾。资本越是要提升其私人性的实现,就必然要创造更高层次的公共性,也就是说,资本要实现自身,就必须创造使自身灭亡的条件,这构成资本发展的历史宿命。”^①无产阶级不可能通过纯粹个人主体活动改变历史进程,因此,主体活动是扬弃私有制的规范性的活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感性的人的活动”的客观化结构,对这一生产方式中拜物教的批判不仅在于揭开其神秘面纱而且要使其成为规范性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对象。这种规范性活动就是现实的合规律的活动,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②以上分析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意义上的主体,作为主体的人应当如何行动。据此,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才找到真正的理论基础。

二、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审思

海德格尔指出:“因为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了,所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余的历史学优越。但因为胡塞尔没有,据我看来萨特也没有在存在中认识到历史事物的本质性,所以现象学、存在主义也没有达到这样的一度中,在此一度中才有可能有资格和马克思主义交谈。”^③马克思深入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提供了对主体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路径,为我们反思以往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提供指导。

1. 认识论主体与存在论主体

计划经济时代不谈主体,20世纪80年代针对计划经济时代忽视和压抑人的主体性现状,哲学界产生了“主体热”。主体概念由哲学领域引进到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中来,产生了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教育弘扬主体性,与市场经济的发展相呼应。发展市场经济,需要独立、自主人格,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培养学生的独立性、自主性、创造性,体现了教育对中国社会发展现实的回应。那时尚在形成社会利益多元主体,利益诉求的分化不明显,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仅仅关注“主体性”问题。

西方近现代主体哲学的主体是没有社会关系规定的认识主体,笛卡尔的我思主体是这一哲学的开端,它是单数第一称谓的自由的心灵主体,以“意识的内在性”为基本建制。这一认识主体对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有一定的影响,使“主体”具有认识论意义。有学者指出:“‘主客二分’的关系模式之后出现的‘单主体’‘双主体’‘相对主体’等不同的主客体关系模式,是对传统的‘主客二分’的关系模式的反思,‘是在不断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形成的理论演进框架’。”^④然而,这种讨论基于主客二分的认识论,它使“认识主体”凸显。研究者按照主客体关系建构自己的理论假

①桑明旭:《马克思的公共性范式变革及其当代启示》,《理论探索》2019年第5期。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7页。

③[德]马丁·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上),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383页。

④周军虎、崔永江、王永力:《社会互构论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探析》,《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3年第6期。

设,这种讨论凸显了个体能动性维度而不是社会实践维度。

将主体仅仅定位于认识主体会缩小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内涵。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人们开始借鉴西方存在论哲学思考主体问题,胡塞尔的生活世界学说、海德格尔的存在思想等纷纷被引入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中来,试图在存在论上重建其思想基础。然而,自觉地将马克思历史结构中主体思想引入思想政治教育的文章尚不多见。马克思历史结构中主体既是认识论的主体,它要揭示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发展规律;又是存在论的主体,它在存在论上追求人的自由与解放。在认识论的主体的背后,蕴藏着存在论上的社会关系。离开了社会关系,认识论的主体就是一个空洞的抽象物。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①只有从存在论上将人视为社会关系的总和,才能“在其现实性上”把握人,理解主体。

马克思展示了历史结构中的主体形态:“人的依赖”“物的依赖”与“自由个性”状态,揭示了人的发展的总体性的存在论事实。马克思赋予人的存在以丰富的社会关系历史发展内涵,不同时代生产关系造成了不同时代人之间的本质差别,使人有了历史的内涵和规定。教育培养的时代新人是处于新时代历史方位中的人,它是具有新的历史规定性的人。这种存在论上的具体化才能产生对主体的具体化理解,避免对主体进行抽象的解读。

2. 主体性与主体间性

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资本逻辑引发的利益多元主体日益明显,社会结构呈现出异质性与分化性,不同主体产生不同价值取向与追求,主体间的对话、交流、共识问题凸显。20世纪90年代中期,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理论顺应时代需要倡导主体间性的对话、交流,开始关注“主体间性”问题。

“主体间性”理论与胡塞尔哲学有关联。晚年的胡塞尔为了克服笛卡尔以我思的单子式的主体为基点的唯我论,提出了“交互主体性现象学”即主体间性理论。此后,海德格尔的“共在”、雅斯贝尔斯的对话教育、加达默尔的视域融合、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马丁·布伯的“我与你”等理论超越了笛卡尔的“主—客”二分思维模式,丰富了哲学的主体间性理论。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这些理论被引入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拓展了理论的思维空间,使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在注重主体性的同时,发展出主体间性教育理论。理论引进本身就是一种跨文化交流的主体间性关系。这种交流互动使主体间性教育理论注重师生主体间交流,在交流中既重视知识的建构又重视情感、体验。主体间性教育理论通过倡导师生主体间对话教育克服独白式教育,对克服主客对立的主体主义和教师单一主体中心思想有着积极意义。

有学者指出:“在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主体间性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的建构中,则受到了西方传统哲学、西方现代哲学中的主体性、主体间性等思想理念的启发,并直接以此命名。”^②与主体性教育理论相同,主体间性教育理论主导话语来自西方近现代主体哲学,基于资本批判的历史唯物主义被边缘化。胡塞尔思想不具有历史性的社会关系维度,他从主体过渡到主体间的现象学思路是“我如何从本己的、内在的体验领域出发,通过意向性而超越出这个领域,构造出他人或其他的主体,并进一步构造出对于我这个主体和其他主体来说共同的社会世界、精神世界、文化世界以及如此等等。”^③这是一种脱离社会关系的抽象思辨哲学,简单地借鉴胡塞尔的交互主体性现象学,一些理论从主体“原点”出发,提出从“主体性走向主体间性”。这种“走向”甚至成为一些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主体发展的主导模式,它预设了先有人的主体性,再有人的主体间性的主体发展思路。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页。

^②荆德亭:《思想政治教育模式百年演进的三重逻辑》,《思想政治课教学》2023年第3期。

^③倪梁康:《现象学及其效应——胡塞尔与当代德国哲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第145—146页。

然而,马克思视域中的人“不是某种处在幻想的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状态的人,而是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①主体原是被主体间性所规定的,要将其放入社会关系的框架中来理解。在马克思看来,并非先有一个与世隔绝状态的主体,再有一种主体间性关系。主体就处于主体间性关系之中并且是在社会关系中被形塑的。马克思指出:“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②因此,主体间性内在于主体性之中,使主体性具有社会性的特质。离开主体间性的主体性缺乏现实性。一些理论提出要由“主体性走向主体间性”并认为先有主体性再有主体间性,这一理论已经背离了马克思的观察方法。

3. 个体层级与社会层级

在传统哲学教科书中,马克思的社会实践被解释为主体能动地作用于客体过程,这固然不错。但它看不到个体主体活动与社会主体实践的区别。虽然社会实践由个体实践所构成,但两者不能简单地机械等同。由于传统哲学教科书的局限和受西方近现代主体哲学以个体主体为中心的哲学言说的影响,使一些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所强调的主体能动性没有超越于个体主体层面。学术层面的单一性制约理论的深度发展。马克思指出:“资本是集体的产物,它只有通过社会许多成员的共同活动,而且归根到底只有通过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才能运动起来。”^③“因此,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④改变这种力量需要宏观的历史运动——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参与的改变世界的社会实践。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实践处于社会总体层次,它不是个体性的、能动的实践,而是基于社会内在矛盾运动基础上的群众性、规范性实践。

21世纪构筑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将公共性置于核心地位,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借鉴西方公共哲学开始了公共性探讨,它在理论层面未能超越西方公共哲学。公共性理论是主体间性理论的发展,它由关注二元的主体间性扩展到关注多元的、众多的主体间性,超出了二元主体间性互动范围。然而,只有马克思历史结构中主体思想才能对西方公共哲学实现根本超越。

4. 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理论需要补充历史结构这一“短板”

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发展进程与西方近现代主体哲学的演变逻辑密切相关。西方近现代主体哲学理论回避了资本主体性,它把人与一定历史阶段的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各种关系割裂开来,从个体层级、事实层面而非社会层级、现实层面提炼出若干重要范畴,理论发展依次出现了主体性、主体间性、公共性等范畴的演变逻辑,仿佛人的社会联系与发展不是借助于生产方式来实现而是借助“主体性、主体间性、公共性”的“一般本质”来实现。

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发展逻辑偏重于概念诠释与理论逻辑推演,忽视对主体与历史结构关系的研究。其将西方近现代主体哲学范畴按照一定的逻辑关系组合起来,其“理论脉络”呈现为主体性——主体间性——公共性。这一体系看似逻辑严谨,仿佛主体间性是从主体性中“破茧而出”,其后亦然。有学者指出:“由前主体性到主体性,经过主体间性,到公共性或共同主体性,这是一个核心脉络。”^⑤然而,无论是马克思历史结构中主体思想还是现实的人的发展都不是这样的A、B、C的递进关系。

虽然精确地分析主体性、主体间性、公共性范畴对深化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理论问题十分必要,然而,由于缺少生产方式的历史维度,探讨就成为一种抽象的观念运动。西方近现代主体哲学的“理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0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2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7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7页。

⑤参见郭湛:《从主体性到公共性——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走向》,《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

论脉络”成为预设主体发展的普遍理性,就会抹杀“现实的个人”的历史发展的真实进程,难以辨识世界格局演变进程。马克思指出:“历史是不能靠公式来创造的。”^①在社会生活中,没有与这种观念顺序相一致的主体发展公式。百年变局寄予我们的文化自信是越出西方文明优越论的思维藩篱。历史结构的演进决定了主体发展受生产方式制约,主体发展不是“理论脉络”中范畴的递进式发展,而是由生产方式矛盾运动引发的发展。马克思说:“每个个人和每一代所遇到的现成的东西: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②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理论需要排除“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的现象,补充历史结构这一“短板”。在国际风云变幻中,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要保持培养时代新人的定力,理论构建要依据马克思历史结构中主体思想“转向现实本身去寻求思想”,在世界变局中把握时代精神。

三、马克思历史结构中主体思想为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确立了思想路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时代面临着“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③这一现实问题。马克思历史结构中主体思想揭示了历史变迁中的内在机理,启示思想政治教育回答时代之问:紧扣生产方式矛盾运动把握百年变局的堂奥。“世界怎么了”本质在于资本主体性引发“百年变局”,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是公共性发展的动力并支配着变局的方向和进程。显然,“东升西降”是变局的核心,变局的内在张力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资本主体性与共建共治共享的公共性角力,这一本质冲突成为时代前沿性问题。变局的发展趋势是由资本全球化的世界历史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的历史阶段转变。马克思历史结构中主体思想为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的“我们怎么办”确立了思想路标。

1. 观念批判与实践推进

西方近现代主体理论停留于理论思维层面,其理论的推进(后者对前者的反思、批判与改进),仅仅是观念批判。马克思从观念批判走向实践批判,从“副本”(歪曲地反映现实生活的西方近现代主体理论、观念)批判走向“正本”(受资本主体性支配的现实生活本身)批判,从观念世界走向现实世界。马克思考察主体形而上学产生的社会实践基础,对其进行实践批判,瓦解主体形而上学的自足性,通过革命实践消灭形而上学。马克思指出:“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④

马克思指出:“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⑤哲学转变为现实与人的解放是一体共生关系。马克思指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⑥新时代的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必须始终与马克思历史结构中主体思想这一源头活水保持内在关联。它不可能是一种纯粹理论构建,它只能在理论融入培养时代新人的社会实践中,在人的主体性、主体间性和公共性充分展开时,才能形成反映民族特色的标志性理论成果。

当今时代,两种制度并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发展资本主体性为核心,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不断发展壮大共建共治共享公共性。马克思历史结构中主体思想彰显了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取向:发展公共性逻辑,以公共性抑制、削减资本主体性。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624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45页。

③《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537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6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27页。

2. 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时代运行逻辑

主体能动性与社会实践规范性相统一格局是在历史实践中生成和凸显出来的。改革开放以后的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凸显主体能动性维度,自国家“十二五”规划出现“顶层设计”一词后,教育实践需要不同于计划经济时代的指令性规划的顶层设计已经形成共识,主体活动的社会实践规范性维度凸显,以前的仅有主体能动性一维的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就显露出片面性。

“指令性规划”及服务于它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曾经压抑了教育中人的主体能动性一维,改革开放后的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将被压抑的能动性一维释放出来却忽视了规范性一维,今天的历史发展需要规范性的补充,以回归马克思主体概念的能动性与规范性的应有之义。在历史上,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呈现出(改革开放前教育的)重规范性(指令性规划)抑能动性、(改革开放初期教育)重能动性轻规范性、(新时代教育)能动性与规范性有机统一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前两个阶段尚未达到历史唯物主义的主体解读水平。只有马克思历史结构中主体思想才能给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带来重要拓展。

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社会实践的发展孕育出了“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顶层设计。顶层设计将教育放入民族复兴的历程中,使个体主体发展与民族复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程相一致。“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顶层设计承载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存在方式的基本认知和问题判断,成为当代中国教育的标识性理念,构成了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底色。这使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在新时代产生了新的运行逻辑:规范性的顶层设计——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主体性、主体间性、公共性的能动的活动——汇集成革命性社会实践。这一运行逻辑体现能动与规范、个体实践与群体实践统一。

马克思历史结构中主体思想是新的运行逻辑的思想源头,规范着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领域。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依据新的行动逻辑,使学生成为民族复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主体。没有顶层设计的规范性,个体主体能动行为就会成为同历史发展进程相分离的孤立的行动,学生就会成为历史过程消极旁观者;没有个体主体的行为的能动参与,顶层设计就会变成空洞的思想公式,社会实践维度就会落空。只有将顶层设计的规范性与个体主体能动性结合起来,才能生成民族复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历史运动。

3. 使主体间交往与融身社会实践相统一

新的行动逻辑得以运行,需要使顶层设计成为教育共识。达到教育共识需要师生、生生的主体间互动。这需要合理地吸取西方主体间性哲学,通过视域融合、重叠共识、交往理性等对话教育使师生、生生产生默契。然而,仅仅如此,主体间性理论就会背离历史现实。从教育层面上看,在课堂教学中共识的达成基于师生、生生间平等交流与对话。这固然是正确的,但仅仅局限于此,就会形成对历史发展的深深遮蔽,它使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产生误识:似乎共识仅仅来自交往理性与对话教育。然而,共识的达成从根本上说是生产方式发展的结果,共识是对民族复兴历史过程的反映。主体间性商谈交往不可能从主观上建构世界秩序,也不可能塑造社会关系。没有改革开放促进生产方式的发展,就没有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就不会出现培养时代新人的共识。从根本上说,教育共识不是主体间通过对话、商议达成的一种主观设定。

卢卡奇说:“从根本上否认用意识形态解决社会冲突;这就是认为个人和社会集体都应该‘纯粹按照理性’行动,这样就根本不可能再有任何真正的冲突了,任何意识形态也就毫无用武之地了,纯‘事务性的’冲突可以通过合理的协议、妥协等等,得到纯事务性的解决。”^①西方的对话、协商、交往

^①[匈]G·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下卷),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862页。

行为理论都蕴藏着这种非意识形态化倾向,披着非意识形态化的外衣。在教育中借鉴这些理论防止走向与意识形态教育相冲突的道路,排除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处理社会冲突中的作用。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不能仅仅从教育层面理解交往理性与共识,必须上升到历史唯物主义高度,从社会实践维度考察共识。

社会主义社会最具公共性品质,它是形成最普遍、最广泛的共识的社会基础。形成共识需要引导学生认识和投身于社会主义“共享发展”实践。学生越是能认识“共享发展”实践的发展趋势,对自我的存在方式、发展前景的自我筹划就越深入,从而就越是能够自觉地达成共识(个中当然需要对话教育、视域融合、重叠共识),将个体行为融入宏观社会实践之中。

引导学生认识和投身于社会实践,需要使学生的自我意识与现实世界意识相统一。科耶夫指出:“没有世界的人和没有人的世界一样,是一个不存在的抽象概念。”^①人与世界相统一,它们彼此不能分离、不能被孤立地看待。“完全地意识到现实世界,必然也是完全地意识到自我,因为自我包含在世界中,因为自我是一种作用于世界和接受世界的反作用的‘人间的’现实。”^②这里,在被认识者(现实世界)中就包含着认识者(自我),因为自我包含在世界中。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的关系不是彼此外在的,而是合一的。马克思认为主体产生于社会存在的发展过程之中,生产方式的类型直接影响到主体的存在方式,只有把主体放入历史结构中才能使之得到阐明。“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③如此,处于历史结构中的主体对自我的认识必然导致对外部现实世界的认识,而对外部现实世界的认识就是自我认识。在这个意义上,真正的自我意识必须扩展到一种现实世界意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教育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正确认识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④这种教育将学生的自我意识扩展到现实世界意识之中,从历史发展大势把握时代问题。当学生认识整个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时就是认识自己——认识自己所处的新时代、历史方位、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认识自我在社会存在中的地位和作用。只有达到现实世界意识与自我意识统一,才能形成自觉、自为的主体,发挥时代新人的社会历史作用,让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成为召唤新时代新主体的生成过程。

4. 在“两个大局”中确立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任务

百年变局的重要变量是民族复兴,在应对全球性挑战(核威胁、全球气候变化等等)中,只有实现民族复兴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积极互动、发展公共性才能为人类赢得美好未来。“两个大局”确立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任务: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推动公共性发展。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有双重任务:一是推动民族共同体的公共性发展。国内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需要以人民为中心,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形成民族最广泛的社会共识,实现民族复兴,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奠定基础。二是推动国际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公共性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扬弃资本共同体,向自由人联合体发展的必由之路。今天,资本主体性仍然发挥作用,一些国家立足资本主体性牺牲他者主体性。然而,资本主体性依赖于主体间性,资本主体性发展的悖论在于破坏主体间性和公共性(引发全球各种危机)最终抑制资本主体性的发展。资本主体性具有自反性,目前尽管单边主义抬头,然而“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却无法维系资本主体性发展,百年变局中资本主体性发展趋势不是“资本帝国”的

①[法]科耶夫:《黑格尔导读》,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366页。

②[法]科耶夫:《黑格尔导读》,第366—367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8页。

④《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第377—378页。

降临而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公共性发展。“资本主体性在发展中必然呈现出单一主体、文明输出、强制扩张、零和博弈等特征。基于此,可以发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逻辑与资本主体性逻辑根本不同,其倡导的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和原则鲜明体现出多元主体、文明互鉴、内涵辐射、合作共赢等特征。相对于资本的单一主体性逻辑而言,我们可以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逻辑称作公共性逻辑。”^①人类命运共同体公共性与单一资本主体性是对立的,在“两个结合”指引下形成的“中国方案”,其内在逻辑能够消解单一资本主体性,推动公共性发展。这一方案对于克服单一主体性,发展共商合作的公共性具有特殊的时代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世界大变局中,中国持续快速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前进,成为世界格局演变背后的主要推动力量”。^②这一力量既是中华民族的主体性、主体间性和公共性合成的力量,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实践性、科学性的力量。因而,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具有世界意义,它阐释“中国方案”,引导学生认识历史趋势,使学生具有全球视野和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参与世界变局历史进程,为打破国家间的“核心—边缘”区位,为世界历史发展过程成为发展公共性的“公力”过程贡献力量。

(责任编辑:陈 雪)

Implications of Marx's Thought on Subjectivity in Historical Structure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n Subjectivity

SUN Jianhua

Abstract: Marx's thought on the subjectivity in historical structure is based on its critique of the logic of capital, placing the subject into the historical structure. It posits that subjectivity, intersubjectivity, and publicity are generated and constructed through the historical movement of the mode of production. This thought reveals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historical changes and inspir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n subjectivity to delve deep into the reality of the contemporary era, closely aligning with the contradictions in the movement of the mode of production to grasp the profound changes unseen over the past century. This thought has established an intellectual roadmap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n subjectivity. It suggests that such education should combine ideological critique with practical advancement, unfolding its operational logic in the new era, and unifying intersubjective interaction with social practice involvement, thereby establishing its historical mission by coordinating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ituations.

Keywords: Marx; historical structure; subjectivity though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n subjectivity

About the author: SUN Jianhua, PhD in Law, is Professor, PhD Supervisor and Dean of School of Marxism, Soochow University(Suzhou 215123).

^①桑明旭:《资本主体性的历史批判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公共性逻辑——兼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哲学基础》,《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

^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44页。